

价格：劳动决定还是市场决定？——与韩彪同志商榷

Remarks on Price Mechanism of Market Economy

王则柯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教授 广州 510275)

拙文《价格机制劳动价值说的局限和误导》，得到韩彪同志的商榷，十分高兴。价格机制，可以说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值得深入讨论。这里，仅就《价格究竟是由谁决定的》(《科技导报》1993年第5期，以下简称韩文)的若干质疑作一回应。旨在抛砖引玉，求索真理。

市场供求决定商品价格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是资源作为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的信号和度量。因此，商品的供给情况和需求情况相结合，才能决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如果供不应求，说明商品价格偏低，市场力量会使价格上升；如果供大于求，说明商品的价格偏高，市场力量会使价格下降；如果供求平衡，说明度量恰当，价格正确地反映着商品的相对稀缺性。这就是价格机制的供求决定论或市场决定论。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或劳动价值说的片面性，一是在供求关系中只重视供给方面，轻视需求方面；二是在供给方面又只突出劳动这个要素，忽视资源、资本、气候水土、个人天赋等其它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中确实存在无法用劳动价值量衡量的内容。所以，我们认为劳动决定论不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关于价格机制的科学学说。

梵高当年画《鸢尾花》，连糊口的钱也挣不到。可是现在，他的这幅作品竟然能卖出5390万美元的大价钱。画家早已作古，作品价格之上扬，完全是需求膨胀的结果。过去几年，随着粤菜风行带动人们口味的变化，在一些地方，鸡爪和肉鸡的比价从大约1:5变成接近1:1。最近，由于吉祥号码崇拜，一个8888这样的电话号码可以比普通号码贵出20万元。吉祥号码比起普通号码，多包含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答案应该是零，相信大家都同意。所以，如果劳动价值决定商品价格，吉祥号码的身价就不会比普通号码高几百倍。

这些年，我们向外商出售了一些未开发土地的

若干年使用权。未开发的土地，也不包含什么劳动价值。事实说明，只要是拿到市场上作为商品交换而又确实有社会需求的东西，哪怕不包含多少劳动价值，也可以卖出很高的价钱。同样，一个谣言摧毁了需求，可以使得原来在日本市场上畅销的一种美国糖果，变成滞占资金、空耗仓容的滞货。杭州的“娃哈哈”去年在南京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在许多这样的社会经济现象面前，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显得非常苍白和脆弱。

关于“基础加波动”的理论框架

自苏联版政治经济学问世以来，经过大半个世纪的保护性经营，价格理论的劳动价值说已经发展成一部庞大的机器。哪里出了漏洞，就在哪里增添附加的限制。在这种情形劳动决定论应如何体现，在那种情形劳动决定论应如何理解，往往都有“曲折迂回”(借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价格学原理》第3页的用词)的出路。例如，为了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不致于太容易被动摇，一些著作就说，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直接决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可以由于供求关系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围绕商品价值这个中心波动。如果你跟着劳动决定论的庞大体系转，一个“可以波动”似乎就足以吸纳对劳动决定论的任何怀疑。但是我们要问，不是20%或30%也不是一倍或两倍的变动而是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变动幅度，“价格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的框架还能容纳得了吗？围绕中心的“波动”倒比“中心”本身大得多，中心何在，基础何在，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这样的理论，怪不得无法在群众中生根。

韩文对供求决定论的商榷，首先也借助“基础加波动”的模式。我们注意到，韩文用了“偏离”的说法。像价值、价格及其波动这样一些本质上量化的概念，其界定不能漠视必要的数量界限，至于在—项具体的研究中是否真的去量化，那是另一个问

题。“偏离”一词用得好。但是,20%或30%的变动可以说“偏离”,十倍、百倍的变动恐怕不能用“偏离”来概括。至于韩彪同志说笔者不敢苟同把十倍、百倍的变动也概括为“偏离”就是错误的思维,我们只感到离奇。

劳动决定论还是供求决定论

诚如韩文所说,劳动价值说也很“重视”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但是大家知道,重视什么,与由什么决定,根本不是一回事。多年来,人们曾努力修缮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以便“容纳”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正如拙文所说,劳动价值和供求关系是一种部分和全局的关系。企图以外延的方式让部分“容纳”全局,这就是价格机制劳动决定论的困境。

相反,价格机制的供求决定论却是在内涵的意义上包含了劳动价值分析。如果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大,它的供应就不容易,从而如果市场需求量也大的话,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高扬。说供求决定论包含劳动价值分析,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的确有不少商品,并不包含多少劳动价值,却实现了很高的价格;的确有不少商品,当需求改变时价格可以变动好几倍。

有人说,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停留在描述经济现象的浅层的认识,而现象的描述与本质的揭示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深刻还是肤浅,值得认真思考。例如面对一种商品,除了规格、价格,供货的时间、地点和数量以外,的确还可以探究是当家作主的工人生产的还是雇佣劳动的产物等非常深层的问题。但是,即使撇开这还不是经济学的争辩不谈,这样的探究必然导致方方面面囊括其中的局面,庞杂而凌乱。理论的境界讲究简明,讲究线索是否清晰、是否抓住了关键,讲究是否可以观察、是否可以操作。拿这个标准来看,劳动价值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既难以观察,更不可操作。正是由于这样,现代经济学直接从商品的价格出发,而不是从所谓“社会必要劳动价值量”出发。事实上,人民群众每天经验着的是价格,企业和政府要求咨询论证的是价格,因为价格是影响经济中消费和生产决策的可观察量和可操作量,而所谓价值却是难于观察和无法操作的抽象的概念,人民群众和企业、政府都不会认真理会它。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正在向实际靠拢,认识到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是复杂多变的,而这些来自社会深层的信息,当然只有通过市场活动中的价格信号才能被灵敏地反映出来。供求关系比起玄深的劳动价值来,恰恰抓住了价格形成的关键。

比较价格机制的劳动决定论和供求决定论,一

种理论庞大复杂仍漏洞百出,一种理论简明扼要却普适有力。究竟哪一种比较科学,哪一种贴近客观事物的本质,答案应该很清楚。十四大以来,许多文章谈到要向国际惯例靠拢,要按国际上通行的市场规则办事,这是在实务的层次上说的。其实,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我们也应当向现代经济学靠拢。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起飞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做出无愧于时代的有声有色的贡献。但是要注意,经济科学的基本理论属于全人类。所以,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不应该强调什么只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这并不贬低我国经济学界,相反,正展现了我国经济学家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也将做出不但国际称颂而且国际采用的贡献的前景。

价格机制,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确立价格机制的供求关系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系的理论要求。

市场力量的两个方面

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的过程,同时又是价格变动反过来影响和调整需求和供应的过程。这是市场力量的两个方面。前者突出价格形成,后者强调资源配置。发育市场,让市场引导企业,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供求关系所造成的价格形势来引导企业。市场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就会紧化供求关系,引起价格上升,吸引企业增加供给,满足市场需求。相反,需求减少,供求关系松弛,导致价格下降,提醒企业减少供给,及时转向,或者升级换代。竞争的市场,就这样用价格信号把信息传递给自主的企业。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迅速认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让市场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方式。但是如果不认同现代经济学关于价格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的原理,市场配置资源的命题又何从谈起?

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是给企业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放手让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局中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倘若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因僵化理论误导的体制而失真,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失却存在的前提。笔者明白无误地陈述价格机制的供求关系说,绝非韩文代言的“只是想强调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而已”。

再说劳动决定论的误导

韩文认为不能将现行价格管理中一些形而上学的做法归咎于价格机制的劳动价值说。但是,政策不能没有相应的理论背景。劳动价值说虽然绕来绕去,却正如韩文写得明白的,总认为生产成本是

劳动价值的“主要部分”。这就是房地产的“成本加上百分之八利润”这样的价格政策的理论基础。有人说,成本加成也是国外企业定价的方法之一,难道人家也是受了劳动决定论的误导?这样提出问题,是把政府的价格政策和企业的定价方法弄混淆了。如果不违犯政府制定的公平竞争法,某个企业就是扔骰子定价,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市场规律自然会对他作出奖惩。但是作为政府政策,那就离不开它的理论基础,一定要考察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否一致。事实上,恰恰是上述从劳动价值说看来貌似平等的价格政策,造成了效益好的企业和效益差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而由于政策误导受打击的,又恰恰是效益好的企业和国有企业。其实,外资企业对成本加百分之八利润这样的价格政策有豁免权,天经地义。如果用成本加多少的尺子去限制,因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人家就不会来投资经营。并非人家无法无天,只怪我们作茧自缚。国有企业所要求的,也正是这种平等的竞争环境。现在大家都说“复关”,关贸总协定的理论前提之一,就是商品的价格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至于成本多少,是企业自己的事。市场竞争,在有些方面,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才有企业家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才有中华的经济腾飞。

我国森林资源本来就贫乏,几十年来又进一步萎缩,价格被劳动决定论误导是重要的原因。据《科技导报》去年9月号上官增前的文章,长期以来,我国木材价格中只包含采伐成本和运输成本,很少考虑营林成本,更没有考虑森林资源本身的价格。林业部和财政部决定,从今年开始,纠正被误导的价格政策。再看劳动决定论误导的能源价格,不仅使国有煤矿至今未能摆脱开采越多亏损越大的困境,而且造成我国的能源效率大大落在同样也不先进的印度后面。《光明日报》今年3月10日的文章,明白点出“根据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就没有价值的理论来否定资源的价值”是问题的症结。再不正本清源,改弦更张,自70年代以来聪明了一些的中东石油大亨,说不定也会耻笑我们。

强调供求决定论,并不是说国家可以放弃对价格的管理。即使将来市场发育得比较好了,国家对价格的管理也是需要的,但管理的重点是在受权专营的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和关系国家发展后劲的事业方面。这牵涉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和市场力量的盲目性等问题,我们将另文加以说明。

关于可操作性及其他

韩文提出,劳动价值比价格形势所反映的供求

关系(可)操作性要强。我们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实际如何,大家自可判断。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为价格机制劳动价值说辩护的文章,也不这样认为。

韩文诘问,如果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那么凡供求一致的商品,它们的价格就应该一样。笔者实在不能领会这种逻辑。大高个老张和小个子老李各买一套合身的衣服,难道他们会挑选一样的尺码?何况,与供求关系决定商品价格相比,衣服之是否合身(而不是是否得体,甚至时兴),是简单得多的事情。

基于不同的理论,身处不同的环境,人们关于市民对物价波动的心理承受能力作出不同的分析,不妨存异。按照我们的体验,一直到80年代之初,比起其他大城市来,广州市民的实际购买力处于最低的位置。难得出差到上海、北京、西安、武汉或者长沙,都要为同事为亲友带回包括猪头肉在内的副食品。后来,广州的物价改革起步较早,经过1982、1983年前后开始的起伏波动以后,由于从价格方面解放了市场力量,居民很快尝到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甜头。这就是他们的学校。1988年出现全国规模的通货膨胀,各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抢购。这年8月底风潮最大之时,笔者正好从广州到全国首富的大城市公干,深为民意一时之沸怨所震撼。程度真是相差很远。当然,个人的感受未必就是完全准确的纪实。但是,说在80年代广州市民对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好处就已经有比较实在的体验,应该能够成立。类似珠海的重奖,在别的一些地方居然引起烦恼,在这里却不会。

记得在80年代中期,上海的报刊曾经发表过不少文章,讨论上海在一些方面当时不再领先的原因。上海的朋友不怨天,不怨地,刻意提出和分析与广东相比为什么显得“精明而不高明”。这一讨论的境界很高。在笔者看来,这一讨论为上海90年代后来居上的腾飞作了前期的思想准备。

结 语

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深刻地指出,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提出应当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导报》能够就价格机制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开展讨论,笔者十分佩服。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认识不一致不要紧,大家切磋探讨,就会接近真理,共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的才智。

(责任编辑 冷远猷)